

中华百年祭

ZHONGHUA BAINIANJI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从刀俎鱼肉 到勇敢说不

策划：陈 涌
编著：廖代茂
杨会国

外交
图文
档案

1840 ~ 1945

◆ 书中一页页依旧方而正的汉字，一幅幅略显沧桑而明晰亲切的黑白图像，在向我們诉说着那动荡与曲折的巨变之路。
◆ 该书图片绝大多数来自于北京图书馆，解放后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家时，共收缴图片10000多幅，共选出1000多幅编成该书。

从刀俎鱼肉

外交
图文
档案

中华百年祭



重庆出版集团

1840-1945
外交 图文档案

策 划 陈 涌
编 著 廖代茂 杨会国

中华百年祭
ZHONGHUABAINIANJI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百年祭·外交 / 廖代茂, 杨会国编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5 (2007.1 重印)

ISBN 7-5366-7591-7

I. 中… II. ①廖… ②杨… III. ①中国—近代
史—1840~1945 ②外交史—中国—1840~1945
IV. 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4780 号

中华百年祭·外交

ZHONGHUA BEINIANJI WAIJIAO

廖代茂 杨会国 编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陈 涌
责任编辑: 周显军
责任校对: 许玉萍
装帧设计: 向加明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双安分色制版公司制版

重庆市九龙坡区圣利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书林图书发行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9 × 1194 1/24 印张 8

字数 94 千 图片 131 幅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印数 8 001 — 13 000

ISBN 7-5366-7591-7/K · 431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书林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者的话

鸦片战争前,中国和周边许多国家建立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体系——以藩属国向清朝纳贡和清朝对其册封为表现形式的宗藩关系。清统治者陶醉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但西方列强借助坚船利炮强行撞开中国国门,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轰然倒塌。不仅和中国具有传统宗藩关系的国家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且自身也难保全,领土和主权遭到严重破坏,被强行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滑入半殖民地深渊,丧失了独立发展的可能性。晚清民国时期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史,是被歧视和宰割的历史。本书收集大量珍贵的图片,以记下那一个个让中国人心碎的瞬间。

本书对所谓“专家外交”、“革命外交”、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由来与发展、鲜为人知的蜜月时代的中德关系、抗战前期中国“苦撑待变”的外交,即尽力中立德国、力争苏联军援,力促英美参战都进行了重点介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外交的另一面也有所揭露。

本书记录了中国外交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对一些重要外交家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所进行的奋斗予以专章介绍。外交是由实力决定的,爱国外交家的努力,因为国家实力的原因成果毕竟有限。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外交的希望。

本书以1945年抗战时期结束为下限,其后4年的外交,今后将专书介绍。

本书除非十分必要,一般不用注释,重要的参考书目或文献附于书后。

本丛书,大胆尝试将近代史按专题分类介绍,收集了珍贵图片千余幅,力图改变一般史书的呆板面孔,但限于学术水平和文字修养,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希望广大读者多加批评和指正。

目 录

第一篇 晚清外交

一、从“天下共主”到“东方市场”：鸦片战争前对外关系的状况和格局 /2

清朝视自己为“天下共主”，其他国家均为“外藩”、“蛮夷”。但是经过工业革命后的西方，进步一日千里，西方强国已将中国看作是待进入的“东方市场”。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想进入这个市场，可惜清廷浑然不知这种变化。

二、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层层枷锁：不平等条约的形成和发展 /12

从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第一天开始，西方列强和俄国、日本等就不断地强迫清政府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就如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层层枷锁，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三、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晚清的外交近代化 /36

清政府本不愿与洋人打交道，但是随着外国侵略的不断深入，清政府不得不与洋人往来，从设立“总理衙门”到设立“外务部”，标志着清政府外交近代化进程在不断发展。

四、频揽“洋方”为自救：清末新政时期的外交和内政 /49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对西方各国的政治热心起来，不断派人前往考察，显示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清政府从西方国家攫取了什么样的“自救良方”？

第二篇 中华民国时期的外交

一、枷锁依旧：北洋时期的外交 /70

由于国内政局动荡，列强仍伺机侵略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层层枷锁依旧套在中国人民身上……

二、“光荣”与“屈辱”：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 /111

从“外交革命”，到抗战胜利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取得了外交上极大的光荣；但外蒙独立又是当时外交的极大屈辱……

第三篇 近代著名外交家

一、近代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 /164

清代任命郭嵩焘为驻英公使，当时的中国，向国外派使节被看成是有伤国体的奇耻大辱，顷刻之间，郭嵩焘就成了一个“卖国贼”，他的湖南同乡为他感到羞耻，甚至想毁掉他的老宅……

二、虎口夺食的外交家：曾纪泽 /166

曾纪泽以其外交天才迫使俄国人交还了已占领的伊犁，时人形象地形容曾纪泽是“折冲樽俎，夺肉虎口”。这位外交官还亲自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

三、大清裱糊匠：李鸿章 /169

他是清廷最倚重的大臣之一，他是被人骂为“卖国贼”的人，但他对自己的评价却是“裱糊匠”。他这个“裱糊匠”裱糊水平高吗？

四、历经三个时代的外交家：颜惠庆 /176

他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外交卓有贡献，在历次的谈判中总是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曾经在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担任过政府要职。

五、近代中国第一位说“不”的外交家：顾维钧 /179

顾维钧有“美男子”之称，在27岁时就被任命为驻美公使，是当时最年轻的外交使节。他在巴黎和会上为维护国家权益的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

六、革命外交家：王正廷 /183

王正廷，1905年就加入了同盟会，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党人，1919年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全权代表，由于坚持拒签对德和约，获得舆论好评。

七、资深外交家：王宠惠 /185

王宠惠早年加入同盟会，长期从事外交、司法工作，抗战爆发后曾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抗日声明，其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王宠惠从外交上予以配合。

八、“国舅”宋子文 /186

“四大家族”的主要成员，1940—1942年充当中国常驻美国代表，1945年4月同共产党代表董必武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旧金山会议。

主要参考书目 /188

第一篇 晚清外交



一、从“天下共主”到“东方市场”： 鸦片战争前对外关系的状况和格局

1. 与亚洲邻近诸国的宗藩制度

在传统的“天朝”观念下，中国自以为是“天朝上国”、“礼仪之邦”、“上邦”，视邻近各国为蛮夷之邦。邻国中东有朝鲜、琉球；中南半岛有缅甸、安南（越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西南有尼泊尔、哲孟雄、不丹；中亚有浩罕、哈萨克、布鲁特、阿富汗等，以及稍远的苏禄，在清朝前期都或先或后同中国正式建立了宗藩关系，都是向中国人贡的国家。其中又以中韩、中越的关系最为重要。其基本形式是入贡和册封：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按照一定的期限（贡期，一般三年一贡，也有五年或十年一贡的）、派遣一定职位的官员（贡使）、沿一定的路线（贡道）到中国京城，按一定的仪式将所带土特产品（贡物）献给清朝统治者，是为入贡；另一方面，在他国来朝入贡，朝廷以“嘉惠远人”的心态，给以赏赐，它们的新统治者即位时，清朝皇帝颁发一定格式的表文以确认其地位，是为册封。在封贡体系中封赏者是天下共主，朝贡者是外藩属国，无国际对等的概念。入贡和册封直接体现的是清朝最高统治者与有关各国最高统治者之间地位尊卑之别，实质上所反映的则

是封建等级制的国家关系。

但是中国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宗藩双方的关系仅止于礼仪、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朝贡贸易是天朝体制下周边各国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途径，明清两代即以此维持沿边外夷长期的和平关系与经济往来。

当时清朝中央政府体制中，也没有专掌外交的机构，只有礼部和理藩院，分掌由海道和陆路前来的“藩属”朝贡事务。礼部负责东南邻国及南洋西洋番国事务，理藩院负责西北包括俄国及西南番国事务。清政府和外国发生交涉时，往往把这些国家一概作为“藩属”看待。

2. 与欧美诸国的关系和东西文化冲突

欧美国家包括从海疆来的西欧、北欧、北美诸国，和从陆路来的俄国。15世纪末，欧洲人追求黄金和东方商品，促成了地理大发现，东西交通因而发生“革命”，欧洲人发现通往东方的新航线。西方各国为寻求财富、发展贸易而相继由海上东来。西方国家来华活动最积极的最初是葡萄牙。1516年（明正德十一年），葡萄牙麻六加总督就遣使来中国要求通商，这是近世欧洲人到中国之始。16世纪来华国



荣勳(1870-?), 字竹农，满洲正白旗人，曾任理藩院左侍郎。



善耆(1866-1922)，字艾堂，满洲镶白旗人。承袭肃亲王，曾任民政大臣，理藩大臣。

澳门大炮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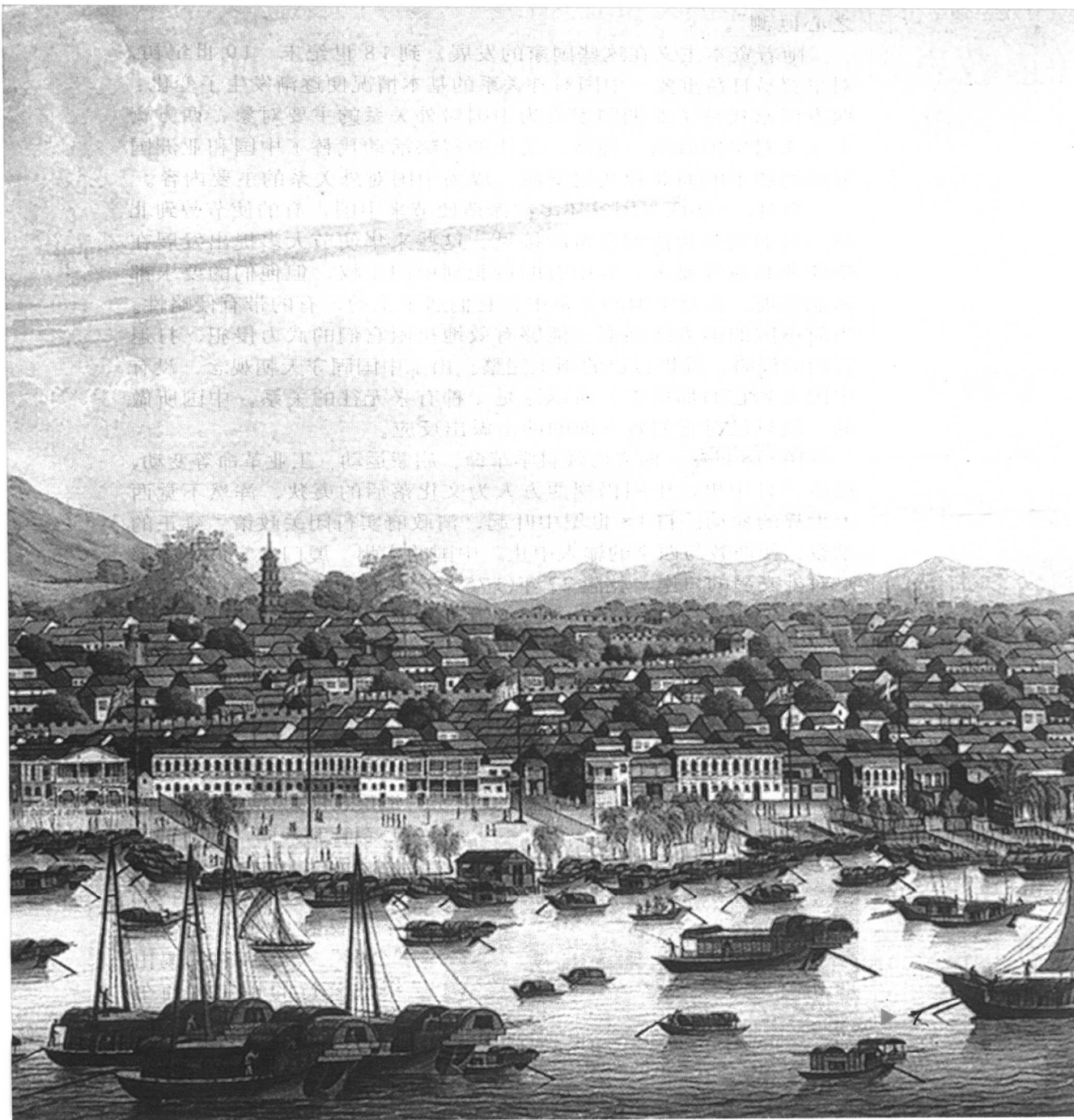




家还有西班牙，17世纪有荷兰、英国、法国、俄国，18世纪有奥地利、普鲁士、丹麦、瑞典、美国，19世纪前期有比利时等。早期殖民主义者曾力图在中国建立据点，夺取中国领土。1553年，葡人借口要曝晒水渍“贡物”，请准他们在澳门上岸，到1557年他们就在岸上定居下来。最初，他们甚至不纳地租，只对广东海道每年纳贿银500两。澳门就这样为葡人所盘踞，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领土上所建立的第一个侵略基地。1624—1641年西班牙人占据台湾北部一带，荷兰人1624—1661年占领台湾。俄国是从北面内陆与中国发生接触的惟一欧洲国家，俄国在占领西伯利亚后，不断地向中国东北、北部及西北边疆进逼，边境及边界问题成为中俄关系中的主要问题。这一期间，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纷纷进入中国，海外扩张兼具宗教目的。总之，“抢掠、杀戮和武力的经常使用，这些就是欧洲对于中国商业接触开始时的特色。欧洲人是在配得上‘洋鬼子’这个称号时，才被加上这个不愉快的称号的”（西方作家高斯特）。明朝给事中（监察官）王希文在奏疏中说他们是“犬羊之势莫当，虎狼

18世纪，欧洲风格的建筑开始出现在广州的一个严格限制的区里，外商获准在那里装卸船上的货物。





之心叵测”。

随着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发展，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华贸易日益重要。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情况便逐渐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代替了亚洲国家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对象；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活动代替了中国和亚洲国家间的和平的商业和文化交流，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

当时，一些西方国家还多次派遣使节来中国，有的使节曾到北京，有的还受到清朝皇帝的接见。这些来华使节大多提出发展在华商业利益等要求，其中有的侵犯到中国主权，但他们的要求都未能实现。在对中国的关系中，它们居于主动，有的带有侵略性。当时中国的国力还强盛，能够有效地抗拒它们的武力侵犯，打退它们的侵略，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由于中国固守天朝观念，没有中国人到它们那里去，所以这是一种有来无往的关系，中国所做的一般只是对它们各方面的冲击做出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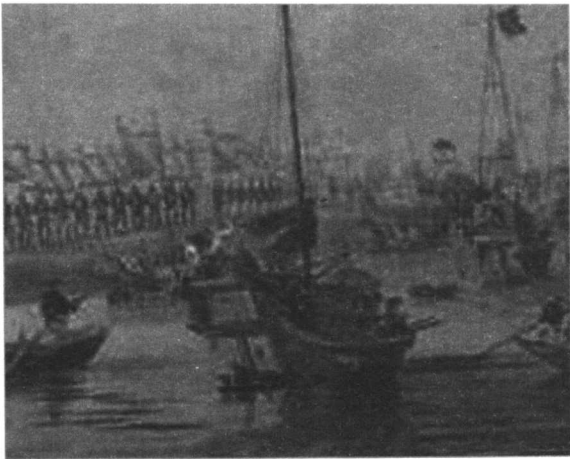
16—18世纪，西方历经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变动，进步一日千里，中国仍视西方人为文化落后的夷狄，浑然不觉西方世界的变动。自18世纪中叶起，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雍正的禁教，使西教与西学的输入中止。中国的广州、厦门、宁波本来都是对外交易的口岸，乾隆22年(1757年)以口岸太多，不便征税与监督，中外通商限定广州一处。从此以后80多年间，广州便成了澳门(这是葡萄牙人居留之地，其他外国人也许可居住)以外由海上来华的外国人居住的惟一地点。清廷重农抑商，又不能完全禁绝对外

贸易；为避免夷商变成类似明代的“倭寇”，防止人民与外国人联合起来造反，所以以猜忌防范的心态管制外商，严守“夷夏之防”，颁布了一系列“防范外夷”的条例。1760年，又在广州成立所谓“公行”，一切对外贸易由组成公行的指定行商垄断经营，不准行商以外的

19世纪，清代十三行。



私商参与。公行又是外人和中国官府间的中介，外人和中国官府间的一切交涉往来，都要通过行商来办理；外商居住、行动备受行商限制；严格限制国产货物出口，同时禁止中国商人自造海船。后来嘉庆、道光年间屡经重订，其基本精神始终是要限制外人和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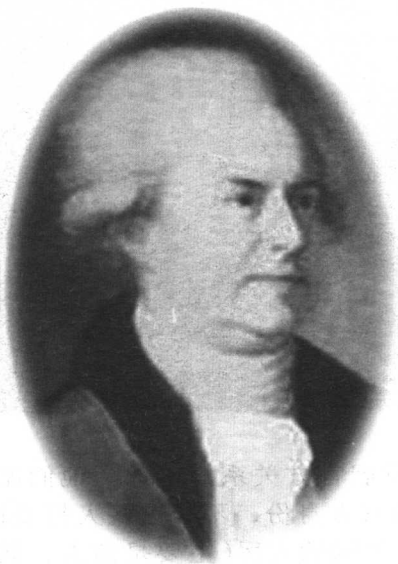


进入广州的外国商船。

人民之间的交接来往。不与外人发展官方关系，不承认他们派驻广州的代表(领事、商务监督等)的官方身份，不与这些人打交道，不与它们建立国交；有限制地允许外国的人民(主要是商人、教士等)入境，严格加以管理。马克思说：“毫无疑义，17世纪末叶在对华贸易上彼此竞争的欧洲各国间的纷扰倾轧，曾给满洲人所采取的排外政策以一种有力的帮助。但是更主要的，乃是由于这个新王朝的疑惧，它惟恐外国人会支持大部分中国人被鞑子征服后大约最初半世纪所存在的那种不满情绪。”另一方面，清政府之所以有可能推行这样的一种对外政策，是由于当时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性质，和外国的贸易来往对中国来说并非必不可少，因而造成清朝历代皇帝固步自封、狂妄自大。如1793年，乾隆帝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但是西方人嫌通商口岸太少，一口贸易对其商业利益十分不利，希望能至闽、浙一带发展。不满公行的间接贸易制度，因外商不得与官府直接往来，需由行商转达（其方式是：外商→买办、通事→行商→官员）。税收问题，清廷的海关税原仅4%，但由于行商及官吏的需索无度，巧立名目，正税之外的税目竟达60多种。居住行动不自由。如外商须住在广州洋行内的“夷馆”，由行商约束行动，冬天须回澳门过冬。夷妇不得入境，以防“盘踞之渐”，萌

英国第一次访华使
团的正使马戛尔尼。



生在华定居的念头。禁止夷商买中国书及学习中文，不得乘轿，并不得直接雇用华人仆妇。中国法律严苛，洋人与中国发生民事案件，我国官吏总劝双方和解，甚至不过问，等于自动放弃司法主权。中国允许随意逮捕和折磨人犯，洋人们认为审判不公，1784年后，英国已拒绝再把人犯交予中国审理。“商欠”问题，外商可向行商放债取利，但行商所进口的英国毛织品严重滞销，再加行商自己也受到官吏的勒索，有不少的行商因而倒闭。商欠在乾隆年间曾高达400万两，英商索求无门，导

致英舰时来逼债。

“产业革命”后，英国对华贸易的迅速增长，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压倒优势，英国工业资本迫切要求开辟中国市场。其实，英国曾经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来达到打开中国市场的目的。乾隆年间（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目的就是要为英国货物打开中国市场，但清廷方面对英国的先进科技以及对中国的潜在威胁视而不见，一直把马戛尔尼当作贡使看待，特别在意觐见礼节问题，坚持三跪九叩首礼，马戛尔尼提出一条件，要清廷派一个和他同一等级的大臣在英王的肖像前也行三跪九叩礼，以示平等。这个提议为清廷所拒绝，最后清廷同意马戛尔尼所提出的以觐见英王最敬之礼来见清帝，那就是免冠鞠躬曲一腿。任务虽未达成，马戛尔尼却已发现中国内部之积弊与隐忧。嘉庆年间，阿美士德又因拒行跪拜礼而被逐回国。礼仪之争表面上是中国传统的天朝观与西方平等国际观的冲突，根本矛盾则在于英国资本主义立意要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封建统治者却坚持闭关自守。由于外交交涉没有效果，英国政府着手准备使用武力来达到其侵略中国的目的。